

· 教育基本理论 ·

仪式、象征权力与学术秩序

——学术会议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张 斌^①

(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 要: 以专业学会的学术会议为对象对学术共同体进行研究发现,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不同力量相互竞争的权力关系网络, 存在着地位等级结构; 作为仪式的学术会议通过生产象征权力, 对学者进行学科规训, 进而生产学术精英和学术秩序, 体现出鲜明的社会逻辑。

关键词: 仪式; 学术会议; 象征权力; 学术秩序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2)01-0021-06

Ceremony, Symbolic Power and Academic Orde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Academic Conference Process

ZHANG Bi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t took the academic conferences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the micro-research path to analyz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getting the following results. Academic community was a power relations net in which different forces were interacting and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there existed a status hierarchy; academic conferences as ceremony exerted discipline on academicians through producing symbolic power, and then produced academic elites and academic order, which took on an obvious social logic.

Key words: ceremony; academic conferences; symbolic power; academic order

学术共同体作为学者间的交流网络, 不仅在学科知识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在学术业绩认可和学术人才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任何一位学者所作出的任何一项知识创新, 只有受到学术共同体同行的认可才能从私人知识转变为公共知识。学者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地位和声

誉, 也取决于同行对他的评价和认可。因此, 在默顿(Robert Merton)看来, 这种认可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原动力”, 它“源于制度上的强调”;^[1] 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也指出, 学校可以赋予一个人地位, 但威望则可能是大学以外的专业团体授予的。^② 可见, 倘若期望在学术生涯中对学术共同体有

^① 收稿日期: 2011-10-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36-1); 华东师范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行动计划(PY2011002)

作者简介: 张 斌(1981—), 男, 陕西西安人,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从事高等教育社会学、学术管理与政策研究。

所贡献,学者就需要置身于学术共同体,与本学科同行建立学术上的联系和交流。一般而言,学者主要通过专业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联系和交流。在此,本文仅考察学术会议,

专业学会是学术共同体的关键性组成部分。科学史研究表明,近代科学之所以在大学外诞生、勃兴并逐渐在大学内部制度化,与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法国和德国皇家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科学史专家麦克莱伦三世(James E. McClellan III)在《科学重组:18世纪的科学学会》(Science Reorganized: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一书中翔实考察了该时期科学学会在科学崛起中的作用。他指出,学会不仅承担了科学研究工作,还建立了一系列如研究资助、研究奖励、期刊发行、同行评议和学科规范等制度。^[2]可以说,专业学会制定和发展学术制度和规范的过程,正是科学活动体制化的过程。在专业学会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学术共同体在各学科或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反过来还不断发展、完善着专业学会、学术期刊系统等内在要素。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考察美国学术组织发展史时所指出的:离开“专业的联系”即专业学会,我们便无法认识学术生活;对于学术研究而言,除非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会,否则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将一事无成。^[3]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现在学者们一般在判断一门独立学科时,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看其是否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即专业学会。^[4]

然而,学术共同体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系统,不同的学者在其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他们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学术资源、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进行激烈争夺,以期不断扩大自身的学术话语权,进而为下一轮争夺赢得有利条件。因此,同其他场域一样,学术共同体亦是一个“汇聚了具有一种结构意味的各种力量的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着这些力量的转变或保持的斗争的场”。^[5]不同的学术组织、学者作为不同的力量汇聚于学术共同体之中,使学术共同体成为一个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并呈现紧张状态的权力关系之网。本文试图采用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路径,将专业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作为仪式进行社会学分析,以学术会议这一“小”事件中的权力关系,透析学术共同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权力运行机制。

一、学术会议能否作为仪式予以研究

自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以来,“仪式”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议题,阐释仪式中可见的人类行为的文化意义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独特传统。学术会议这种现代社会事件能否被当作“仪式”予以分析,从而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与权力关系呢?

对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以契约、律法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是否需要研究在传统社会中发挥整合功能的仪式。早期人类学家认为,仪式是前现代社会宗教实践的一种确定性特征。^[6]迪尔凯姆在其早期著作中认为,现代社会的整合无疑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异化和失范预示着整合的失败;在其后期著作中,他则期待能在现代社会中寻觅到宗教的“功能性等价物”——即那种能够发挥整合功能的世俗性组织和仪式。^[7]英国现代人类学家科恩(Abner Cohen)、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日常生活都充满着与原始部落雷同的象征行为,都带有原始仪式特点,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现代人亦演戏般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符号角色,^[8]而且仪式并非总是与乡民文化或宗教行为联系在一起。^[9]可见,现代社会中的人类行为,特别是展演行为也可以当作仪式加以学理上的考察。

其次,学术会议何以适合仪式分析?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观点,学术会议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完全适合于仪式分析。但学术会议之所以适合于仪式分析,还在于学术共同体内在的组织文化特性。唐尼(Kenneth J. Downey)曾驳斥了学术共同体是有机团结的观点,认为机械团结模型更能解释学术共同体的组织文化特性:学科分立是一种机械分工,所有科学家从事的是同样的活动,且出于内在的兴趣;对科学家的社会控制,依赖的是科学的技术和道德规范的内化;奖励系统通过科学奖励为学术共同体树立了行为标准和典范,其功能就如同民间传说将部落英雄浪漫化那样,为年轻人树立模仿的意义榜样;荣誉系统将荣誉分配给科学家个人或所在机构,而物质报酬则是第二位的。^②由此观之,学术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尽管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因素,但由于学术组织本身的松散性、学术奖励的精神性和价值目标的独特性而更加类似于传统社会组织,具有更多的传统意义。因此,学会会议作为学术共同体中发挥整合作用的关键要素,不但适合而且

也需要仪式分析的视野和路径。

二、学术会议中的地位等级结构

学术共同体是学者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网络,学术会议则由于能够为同行提供面对面的即时性学术交流而在其中发挥着学术期刊、通信等其他交流形式无法替代的功能。每逢某一专业学会的学术会议,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带着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纷至沓来,以文会友,与参会学者交流、切磋,一切似乎都彰显着学术自由的经典大学理念和公有性、无私利性等科学的精神规范。这似乎已成为学者头脑中的共识或常识,不存在任何异常。常识之为常识,就是不断重复的例行常规,不言自明,无须质疑。但如若细致地观察学术会议的运行过程,就会发现这些常识颇值得审视和反思:一方面,学术会议中的学术交流和传播彰显着学术活动内在的知识逻辑;另一方面,学术会议中存在的行政领导、不同地位学者之间的等级结构则潜隐着外在的社会逻辑。

学术会议中的地位等级结构主要表现为三对等级关系:一是上级管理部门领导与(会议承办)院校或研究机构领导的等级关系;二是领导与学者间的等级关系,这主要指上级领导、学校领导与学者间的等级关系;三是学者与学者间的等级关系,这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等级分层结构,包括学会领导、著名学者、知名学者、一般学者以及研究生之间交互的等级关系。

那么,这三对等级关系抑或等级结构是如何体现于学术会议过程之中的呢?

首先是学术会议的座次,上级领导一般就坐于主席台最中间的位置,两边分别是承办单位的领导、专业学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学会会议的规格越高,出席会议的领导级别就越高,这或许是我国学术系统中特有的现象;其次是那些来自知名院校的资深教授、院长等少数著名学者等;而知名学者则就坐于观众席的前几排。有意思的是,有的学术会议中,学者们还要根据座位上的标识对号入座;最后才是数量众多的一般学者和研究生,有的学术会议还意无意将研究生安排于会场的后排或两侧。

接着是开幕式上的讲话,讲话的次序一般也是按照行政职位的高低依次进行,最先发表讲话的是上级领导,其次是学会会长、副会长等,在学会中职位较低或没有职位的学者只能充当“沉默的大多数”。从座次和讲话次序来看,学术会议充斥着外在

的社会逻辑和行政色彩。

然后是学会会议的主题发言和分论坛发言或小组讨论,在开幕式上做大会主题发言的,首先是学会的名誉会长或会长,其次是本学科的个别著名学者,他们往往来自高声望的院校或科研院所,而且发言次序一般也非常讲究。那些学术声望略低的知名学者则被安排在分论坛或小组讨论中做主题发言,主持人一般也是本学科中稍有名望的知名学者,且多在专业学会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而那些不太知名或年轻的学界新人一般不会获得主题发言的机会,充其量也是在小组讨论中向发言人提问或表达自己的一些见解,学术共同体作为等级分化的社会特性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除此之外,与学术会议没有直接关系的会议接站、送站等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充斥着等级化的社会特征。如哪些学者会享受专车接送、由谁接送的特殊待遇,哪些学者仅能乘坐一般的接送大巴甚至还要自己乘车往返,等等。

以上列举的等级关系在学术会议甚至学术系统中可谓司空见惯,学者们一般很少用自己研究专业问题的学术思维去反思和审视学术生活中的这些日常经验,“更少停下来比较一下各自的私人经验与他人的命运”。^[10]但是,我们一旦用学术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学术生活,可能会提出新的问题,进而开启一个不同甚或全新的经验图景和理论认识。具体到以上三对等级关系,至少可就两个问题予以理论上的探究:

首先是学术活动中的行政权力问题。当前对这一议题的共识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当前总是纠缠在一起,行政权力过多介入学术权力。不用说我国古代“官学合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单是建国后国家行政权力包揽、控制一切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教化,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所缓解,但至今仍带给学术机构和学术研究不小的约束和压力,使得学术活动的行政干预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语境。回到学术会议,上级领导出席学术会议并发言,往往是学术会议组织方主动邀请的结果,如若遇到领导临时有事不能出席,则由下级领导或专业学会领导代为宣读其讲话稿,从而体现政府的重视。有意思的是,出席的领导级别越高,似乎就使得本次学会会议的层次、规格越高,在学术系统中占有的地位就越高。殊不知这恰恰是学术共同体发育不成熟的表现,否则也就不会通过领导的出席来宣告其合法性。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接受,领导出席并讲话表面看是对学术会议的支持,但就学术

的内在逻辑而言,显然是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介入,参加过学术会议的学者无不感到一种行政化的社会逻辑。更有甚者,有时领导在学术会议上偶然提到的一个命题或倡议,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风向标,这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

专业学会本质上讲是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的自愿性和学术性组织,强调的是学者的独立自主和学术自由。学术会议是学术自由表达的重要场所,而上级领导、行政官员参与学术会议无异于使这种原本就要求独立、自主的学术交流活动变成政府介入、参与甚至控制的对象。上级领导代表政府以行动性、话语性或象征性方式参与学术会议,使得国家以符号形式出现,在学术活动中显现其力量和权威,实际上隐匿的是对学者认可国家权威的要求和强化,这种符号化干预往往难以被学者察觉。如果我们意识到学术系统中的这种社会逻辑,就不会对近年来博士、教授参加官员、公务员招考的比率不断攀升这一现象感到诧异。

在当前“去行政化”已成为政府和学者共识的语境下,学术活动的行政干预无疑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我国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历史还较短,发育状态较弱,专业学会的学术自主权还未得到真正彰显,这为行政权力提供了介入的可能性。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推动中国语境中的‘去行政化’道路上,除了在强调淡化甚至祛除政府和高校行政部门各种直接(如行政手段)或间接(如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优工程、计划和项目)介入的同时,恐怕我们最需要予以关注的是究竟如何重建我国学术共同体,使之不仅为内部学术成员所认同甚至对其报以忠诚,而且也能够为社会甚至政府所信赖。”^[11]即是说,政府或各级领导需要转变干预学术活动的方式,不直接介入学术活动,还学术活动本身应有的自主空间就是对学术活动最好的支持方式。然而,学术共同体在没有政府直接干预和介入的条件下能否步入良性运行轨道?这实际上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学术共同体本身的运行机制问题。

三、学术会议中的权力、规训与秩序

如前所述,学术共同体是一个“斗争的场”、一个权力关系网络,而学术会议恰恰就成为各种权力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支点,学术会议的展开过程亦即各种权力在特定场合和时间展开斗争和竞争的过程。因此,学术会议不啻为我们分析学术共同体内

部权力运行机制的一个适切的横断面。

1. 象征权力的生产与学科规训

仪式,不仅是社会性的标准化和重复化的象征行为,^[12]也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3]象征性活动的标准化、制度化过程通过生产象征符号而不断生成着象征权力,参加者对象征符号的争夺本质上是争夺其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权力。“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争斗”。^[14]学术会议作为一种学术仪式,具有一般仪式的典型特征,它生产的是学术性的象征权力,譬如学者在学术会议上的可见度(visibility)、话语权,等等。每一次学术会议都是对象征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年复一年的学术会议通过标准化、制度化的过程,无形中强化着象征权力的权威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学者进行学科规训,使其对学科产生忠诚感和学科身份认同。

事实上,从知识发展的角度而言,专业学会的产生是知识专业化的结果;从其社会逻辑的层面讲,则是象征权力的垄断、再生产以及对学者实施学科规训的过程和结果。沙姆伟和梅瑟—达维多(David R. Shumway, Ellen Messer—Davidow)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指出,十七、十八世纪“学会的成立标志了知识划分史上的突破”,“在能够巩固一个网络的范围内,学会毕竟能充当知识把门人的角色”;到了19世纪,“更专门的建制兴起和各个科学学科的专业标准同时建立起来”,于是学者们以“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以整个科学家群体来互相认同”。^[15]如此,不同的学科、专业“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它们推出了各自领域的文化泰斗(这些人被推崇为该领域的‘传统’)。它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行必要的仪式,以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自己的文化。”^[16]

尽管参与学术会议的学者是来自不同学术机构的学会会员,但如前所述,每一次学术会议不断地生产着学术性的象征权力,反复对学者学科身份意识进行强化和确认,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对学者进行着学科规训。例如,一般的学术会议往往会提前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公布下一届学术会议的会议主题或核心议题,大多数学者则不管自己的研究兴趣为何,就依据这一主题搜集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交流观点,学术会议结束后不少文章又见诸期刊杂志,而学界新人则又参考这些论文制造新的论文。一个学科一段时间内的研究主题和学术话语就这样产生了。然而,这一过程对学者的学科规

训完全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的。

学术会议尽管不是学术仪式中能够发挥这一功能惟一的形式,但不失为其中一种关键的仪式。例如,克拉克曾指出,专业学会的作用在于它有助于发展、传播特定学术领域的影响,促进内部的团结一致。^[17]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业学会实行会员制专业学会管理模式,正式会员每年需交纳一定额度的会费,并享有非正式会员不能享有的权利,例如正式会员可接触到还未发表在正式学术期刊上的新近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者确立了优先权;再如那些非正式会员参加学术会议时的会费高于正式会员的收费标准,这一规则为正式会员“建立了一个特权网络,而不享有内部成员资格的人就失去了平等进入的机会。”^[18]这无非是对其会员身份的认可和强化,也是对其学科边界的宣示和保护,使得正式会员拥有了一种非会员难以体验的学科共同情感和认同意识。

通过这种象征符号的生产和传播,作为仪式的学术会议俨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学者们“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19]然而,也就是在这一个过程中,集体的归属感和个人的权力追求往往同时并存于所有的人类行为中。^[20]具体到学术共同体,学者在学术会议中对所属学科或专业学会报以忠诚的同时,也在追逐、争夺着学术会议中属于个人的权力和声望,并试图不断扩大其在学术共同体中拥有的象征权力,提升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地位。

2. 学术精英的生产与学术秩序

尽管专业学会设置了学科边界,排除了那些非正式会员的进入,然而在专业学会内部,即使是能够进入这个特权网络的正式会员,也并非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甚或特权,专业学会通过其“知识把门人”,“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成员的加入以及声望的获得和在学术界地位的提升”,^[21]譬如他们可安排少数学者进行学术演讲而赋予他们一定的象征权力,增加他们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可见度,从而对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等级结构予以控制。这实际上就是仪式通过神圣性的表演过程生产象征权力和权威性,进而维持特定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网络的功能。

在每一次学术会议过程中,学者们围绕学术性象征权力展开争夺和竞争,每一次学术演讲或发言都是对象征权力的获得。象征权力具有累积性,经过十余年甚至一生的学术竞争,高频率的发言或出头露面逐渐使得学者积聚了大量的象征权力,其聚

焦的议题和学术话语也逐渐被学界所模仿,他自己自然而然成为能在这一学科具有话语权的知名学者甚或“知识把门人”。因此,学者的成长过程不仅具有内在的知识逻辑,也伴随着一定的社会逻辑,且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学术研究和竞争,最终仅有少数人成为学科的学术精英。可以说,多数学者都试图成为所在学科的“知识把门人”,因为一旦达至这一地位,他们就可以如马尔凯(Michael Mulkey)所言,能够“控制或指导成员活动的能力与精英成员身份”,“能够对精英的挑选施加较大的影响。”^[22]史蒂芬·科尔(Stephen Cole)也指出,一个学科的学术精英作为学术守门人和评价者,生产并维持着对适当研究问题和技术的一致性。^[23]众所周知,每一次学术会议的会议主题一般都由这些少数“知识把门人”拟定的,正是他们把持着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方向甚或学术话语风格。

同时,马尔凯也认为,这些精英成员也的确为学术知识的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24]诚然,成为学科的学术精英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并做出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贡献,仅仅依赖于学术会议生产的象征权力是难以实现的,但学术会议却为学者学术成果的发表、传播和同行认可提供了其他途径难以替代的可能性。最为关键的是,学者学术业绩的水平如何,占有的象征权力如何,都需要学术会议及参加学术会议的同行予以认可并不断强化方可在学术共同体中发挥作用。

仪式中的象征秩序与现实中的社会秩序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任何社会中的任何象征体系都是一种秩序的建构,都服务于社会现实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建构。”^[25]学术会议在生产象征权力和学术精英的同时,也在学术共同体中制造学者间的差异和特定的学术共同体秩序,并循环往复地通过神圣性的学术仪式强化着学者们的身份意识和秩序认同。尤为重要的是,“仪式的效用不限于仪式的场合”,“在仪式上展示的一切,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26]学术会议上体现出来的等级结构、学科规训经过学者心理和行为方面的转化,形成现实学术共同体中的组织秩序和规范,在学者的日常学术实践中发挥规范、整合和制度化的作用。

以上呈现的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座次差别和区隔,实际上对应的是现实学术共同体的“差序格局”或金字塔等级结构。事实上,学术共同体的等级结构不仅体现在学者个人的学术权力和学术声望上,还体现在学术机构间的学术权力和学术声望上,由

众多学术机构组成的学术系统无疑也是一个等级分化的组织系统。

学术系统或学术共同体就其本性来说,是一个不断分化分层的系统,而作为子系统的专业学会特别是由其举办的学术会议,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到这种分化分层的过程,通过生产和再生产象征权力以加速或强化已有的等级结构。尽管学术系统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几乎每件事或多或少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划分等级,^[27]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会议的功能实现到底是功能主义所谓的普遍主义原则,还是社会建构主义所谓的特殊主义原则在发挥作用?换言之,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发育状态到底是内在的知识逻辑所致,还是外在的社会逻辑使然?如果外在的社会逻辑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我们便要反思学术共同体是否在良性运行,学术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干扰?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学术文化生态的整体优劣问题,是当前创新人才成长与培养过程中亟待澄清的问题。只有对这一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建立和发展一个遵循知识逻辑、具有公信力的学术共同体才指日可待,创新人才培养的学术环境才能具有改善和优化的可能性。

注释:

- ① 伯恩鲍姆通过企业与高校的比较来论述地位与威望在二者中的异同:企业中,地位与威望是同义语,且相互强化;高校中,地位的基础是管理职位的,威望则基于学术造诣。参见罗伯特·伯恩鲍姆著:《大学运行模式》,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0页。
- ② 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分类框架,用以区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社会凝聚或团结的类型,其理论基础是结构功能主义;1957年,滕尼斯则从人际互动论的角度补充了这种分类框架。唐尼综合了二者的分类框架,归纳了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特征。他认为,有机团结的特征是:高度的劳动分工、结构间的功能依赖、个人间的“理性”关系以及保持社会平衡的规范;机械团结的特征是:低水平的劳动分工、结构间的地位关系、基于情感和传统的人际关系以及体现“集体良知”和使个人从属于社会的规范。参见 Kenneth J. Downe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Organic or Mechanical?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69, 10(4): 438-454.

参考文献:

- [1] R·K·默顿. 科学社会学(下)[M]. 鲁旭东,林聚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95.
- [2] 阎光才. 文化乡愁与工具理性:学术活动制度化的轨迹[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2):141-151.
- [3][17] CLARK B R. The Academic Life [J].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234,234.
- [4] SHIMBORI M. Sociology of Education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1979,25(2/3): 393-413.
- [5] 皮埃尔·布尔迪厄.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M]. 陈圣生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7-58.
- [6][7][9][19] 约翰·R. 霍尔,玛丽·乔尼·兹. 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 周晓虹,徐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8,90-91,98,98.
- [8][20][25] 王铭铭.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28-241,241,229.
- [10] 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 社会学之思[M]. 李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
- [11] 阎光才. 亚努斯的隐喻——去行政化语境下的学术精英角色与权力内涵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10(5):5-9.
- [12] DAVID I K.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8.
- [13] STEVEN LUKES. Political Ritu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J]. Sociology. 1975,9(2): 289-308.
- [14]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M].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
- [15] 华勒斯坦,等. 学科·知识·权力[M]. 刘健芝等,编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34.
- [16][2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知识的不确定性[M]. 王昶等,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5.
- [18][27]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 唐跃勤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5,86.
- [22][24] MULKAY M.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Scientific Elit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76,6(3/4): 445-470.
- [23] COLE S. The Hierarchy of the Sciences?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3,89(1): 111-139.
- [26]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0.

(本文责任编辑 骆四铭)